

明人暗事：家族文献编纂中的政治隐情

——以《张太师世家》为例

张 侃

宋明以后的近世家族大略可区分为世家大族、地方望族、普通家族等。世家大族指出现过名卿重臣、仕宦人数众多及连续性强的家族；地方望族指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家族；普通家族即一般民众组成的家族。世家大族因有族人科举出仕，不仅善于问理辨义、舞文弄墨、吟诗填词，标榜自身的文化优势，而且深知文本书写所蕴涵的社会权力和身份认同的功能，往往热衷编撰各种不同类型的家族文献，以彰显家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塑造家族权威。

普门张氏世居温州永嘉县华盖乡，以张璁出任嘉靖内阁大学士为最为重要的一页，一跃而为文化型家族，因此家族文献收集和整理成为家族建设重要内容。家族文献类型中，族谱带有最强烈的自我意识，比较容易被人注意到作伪痕迹，学界已有诸多讨论。^① 其他家族文献也有类似问题，以家刻本面目出现的文集或者个人事迹汇编往往存在粉饰内容。以层累史观而论，文献编纂者生活在具体历史情境，其编纂活动与社会因素有一定的联系，因此编纂动机和编纂方式也往往隐含着社会历史过程。本文以普门张氏在明代万历以张璁事迹为中心编纂刊行的《张太师世家》为例，比勘所辑录的内容与原抄之史籍记载之差异，讨论家族文献编纂中所隐含的朝廷政治矛盾。

一、《张太师世家》之编纂及内容

普门张氏家族历史上最为显赫的人物是张璁，他不仅身居高位，而且撰述

^① 如冯尔康的《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以明人〈新安萧江宗谱〉为例》（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编：《第五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纪录》1991年）以及陈支平的《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

众多。根据许赞所撰墓志铭,大略可知张璁著有《礼记章句》、《杜律训解》、《贞义书院集》、《罗山奏疏》、《罗山文集》、《金滕辩疑》、《大礼要略》、《正孔子祀典》、《郊祀议》等。^①而与嘉靖皇帝的唱和诗赋、谕对奏疏,也一直被家族引以为荣耀之事,曾专建宝纶楼以备珍藏。其在世之日,其中除了奏疏七卷、诗三卷、《礼记章句》曾刊行外,其他著作均为文稿。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劫掠永嘉场,藏有张璁文稿的贞义书院御书楼被毁,文稿散失。在此背景下,万历时期,家族人士开始对张璁文献进行重新整理,张宪文先生校注《张璁集》时,曾说明了《张文忠公集》的编纂经过,^②在此不赘述。不过,张宪文先生对《张文忠公集》与《谕对录》等著作之间的关系及编纂次序并没有详细交代,因此我们尚不清楚张璁的不同类型文稿被后人整理的具体过程。

从《张文忠公集》相关序言所反映的内容看,文献整理上以奏疏为先。现出版的《张璁集》所收录的《徐枋序》和《杨鹤序》均应为《罗山奏疏》的序言。《徐序》的文字与《张太师世家初编》中的《〈奏疏〉叙略》完全一致,因此“公之孙中书君汝纲、汝纪、汝经出公集乞序,余景企有年,不敢辞”^③中的“公集”不是后来所刊行的《文集》;而《杨序》则与杨鹤自己所辑录的《东瓯张文忠公奏对稿》的序言完全一致,所谓“此公之奏议不可不读也”^④,已指出了当时所阅文稿之内容为“奏议”。^⑤《徐序》写于万历五年(1577),杨序写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间隔37年。万历本《张文忠公集》直到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才刊印,之所以指出这些问题,旨在说明,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藏有张璁文稿的贞义书院御书楼被毁后,张氏子孙一直在整理张璁文稿和搜罗史籍,慢慢地扩充内容,如时人赞主力者张汝纪之行为:“出入中外。苦心捃拾,得其余滕。”^⑥由

① 参见许赞:《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忠罗山张公墓志铭》,张宪文校注:《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03—504页。

② 参见张宪文:《前言》,张宪文校注:《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③ 徐枋《序》,张宪文校注:《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④ 杨鹤《序》,张宪文校注:《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⑤ 万历本《太师张文忠公集》以此两序为先,有其合理性。而敬乡楼本《张文忠公集》擅将李维楨序置于杨鹤序前,次序有误。

⑥ 《刘康祉序》,张宪文校注:《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此,他们也编撰了《谕对录》、①《张太师世家》等文献。

《张太师世家》共有初编、二编、三编,分别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四十五年(1617)、四十七年(1619)编成,以辑录史著或者文集中有关张璁事迹的论述为主。辑录张璁事迹的史籍何以名之为“世家”,在《张太师世家》三编均没有明确说明。仅有李思诚的《〈张太师世家〉叙》谈及:

诚景企有年,因手辑御制敕谕、赠制、《国史》及《盛典》、《异典述》并传记、墓志等,汇为一帙,颜曰《世家》,将公之才于是传,公之识于是传,即公之学于是传。后之览斯编者,当知公文章经济具有本原,固非时相所能几其万一也。②

“世家”之体例见之于《史记》之前,③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世家”记载是春秋战国及汉初分封制度下辅佐君主的诸侯以及当时有特殊功勋的人物。由于“世家”这一例目主要用以记载分封制下各诸侯国,刘知几曾有批评:“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世家为称,岂当然乎?”④由此后世史家几乎不用该体例,二十四史除《史记》以外,存于《晋书》、《新五代史》、《宋史》,主要也是以记载地方割据政权为主。

明代史籍中以“世家”记载人物的主张主要见之于王世贞的《弇州山人续稿》,《史传》十卷,以“世家”四卷收录了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朱能、定兴王张辅和宜平王朱永,这是王世贞在明代复古思潮之下模仿《史记》最为典型的例子。⑤《张太师世家》之命名“世家”

① 《谕对录》刊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共34卷。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6,《史部》12,诏令奏议类存目根据“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所言:前后所奉手敕凡381道,因汇为一书,并奏对札子皆随事附之于后。盖孚敬既没,其孙汝纪、汝经等所哀辑也。现存《谕对录》附《敕谕录》第2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7册。不过,《谕对录》还有不同刊本流传于世,如万历年间任巡按浙江御史杨鹤辑有《东瓯张文忠公奏对稿》共12卷;另如梁章钜在温州所见之《谕对录》又是10卷节本,“久之始得读《谕对录》第10卷,然所存者仅此矣,又是公孙汝纪、汝经重镌之节本。”《谕对录》之版本及流传,需另撰文论述。

② 参见李思诚:《〈张太师世家〉叙》,《张太师世家》,初编,道光甲辰(1844)永嘉张氏重刊本。

③ 太史公在《卫康叔世家》中所曰:“余读‘世家言’”,可见当时已有“世家言”之体例。

④ 刘知几:《史通》,内篇卷二,《世家第五》,四部丛刊本。

⑤ 清初傅维鳞纂成:《明书》(第171卷)沿袭了王世贞的做法,“录其功德最著者为开国世家,而不以享国之久暂为重轻”,列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傅友德、冯胜、李善长、郭英10人入世家。(《明书》卷91,《开国王公世家》。)

可能与此有关。

《初编》编纂者李思诚字次卿，江苏兴化人，其祖父李春芳与张居正、王世贞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同科进士，李春芳为状元，隆庆初代徐阶为首辅，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参与修纂《明世宗实录》。^①李思诚对张璁有所兴趣，也非偶然，因其祖父李春芳曾入阁，后与张居正有较深交情，李思诚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进士，曾任浙东备兵使者，^②曾担任“备员史局”。他对事迹近乎张居正的张璁就有特别关注：“读《肃皇帝实录》，其世纪简严，诸大臣生平行履裁削几乎尽，而公独为典核，则江陵张公笔也……因读公集而不能不寄思于两文忠也。”^③比较两文忠之事迹的言论也见之于王世贞的论著中，王世贞为明朝文史大家，又与李思诚有着家学之渊源，^④因此李思诚实在辑录张璁事迹之史籍，其体例命名可能受到过王世贞的影响。不过，王世贞在列入“世家”的标准上择功高之封爵者立世家，而李思诚则没有论说标准。因此，李光缙在《后叙》中特此加了案语，以张璁为“中兴贤相”予以说明：“《史记》：帝王称《纪》，宰相、大臣称《世家》。公中兴贤相也，故以《世家》称焉。”^⑤而杨道宾在三编完成后则解释为：“按《史记》义例，帝王曰《纪》，公侯宰相曰《世家》。世家者，记其人之勋名事业，必有经天纬地之才与铄古凌今之烈，而后载之简策，传之奕襮，令人瞻仰感慕于无穷。”^⑥具体地看，《初编》所辑录的史籍来源为：

① 《明穆宗实录》卷6，隆庆元年三月甲申。

② 参见《明史》第193卷。《李春芳附李思诚李清传》仅有“天启六年官礼部尚书，寻罢。崇祯初，坐纒瑯闲住”。有关内容不多，尚无从知晓在浙江之具体情形，除了门张氏家族文献的序言之外，《康熙温州府志》卷十八《名宦志·武宦》可证其于万历四十七年尚在温州：陈朝，永嘉人，任温区金盘把总功加游击。万历四十七年，率舟师御敌于镇下门阵亡，兵道李思诚上之，诏录其功。

③ 《李思诚序》，张宪文校注：《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④ 李思诚因史学之才，于天启五年（1625）以南京国子监祭酒的身份参与修编《明神宗实录》，担任副总裁。据《熹宗实录》记载：“大学士顾秉谦等具疏推礼部右侍郎来宗道、张鼎、丘士毅、周炳谟、彭凌霄、南京国子监祭酒李思诚俱堪充《实录》副总裁”。（《明熹宗实录》，第58卷，天启五年四月癸卯）其孙李清迂曾策划《建文实录》和《崇祯实录》，见《明史》第193卷，《李春芳附李思诚李清传》。

⑤ 李光缙：《〈张太师世家〉后叙》，《张太师世家》，初编。

⑥ 杨道宾：《〈世家三编〉叙》，《张太师世家》，三编。

书名	著者
《国史》	
《圣谕》、《御劄》、《御制诗》、《诰勅》、《论祭文》	
《昭代典则》	黄光昇
《两朝宪章》	吴瑞登
《肃皇大谟》	范守己
《盛典述》	王世贞
《异典述》	王世贞
《召对录》	李时
《尚友录》	张玺
《今献备遗》	项笃寿
《吾学编》	郑晓
《传》	王世贞
《十善书略》	霍韬
《奏疏叙略》	徐枋
《乡贤传略》	龚秉德
《编年信史》	支大纶
《万历志》	汤日昭
《墓志铭》	许讚
《神道碑》	葛守礼

需要说明的是,李思诚辑录《初编》应不是独立完成的工作,《初编》刊行“校阅”均为张氏子孙,显示出该编应是与张氏子孙通力合作而成。另据《〈文忠公世家〉跋》中“《世家》一帙,乃叔氏蜀郡太守予告休编梓”^①一句,甚至有理由揣测《初编》中的诸多文献就是张汝纪提供给李思诚,并以其名而编成。《初编》完成后,李光缙的《〈张太师世家〉后叙》也是由张汝纪请求所得,“太史氏思成、给事中应麟二公辑张相国行事,自御劄、国史而下,以及传、志、碑铭之属,汇为一帙,名曰《世家》。……光缙入瓯,公之孙二千石太衡君拟付劄

^① 张德明:《〈文忠公世家〉跋》,《张太师世家》,初编,道光甲辰(1844)永嘉张氏重刊本。

删,命使序之,因僭附于卷后。”^①

正因为编辑《张太师世家》是张氏子孙参与进行的工作,按照此逻辑,就不难明白《张太师世家》的《二编》直接由张汝纪辑录的原因所在。《二编》现散佚,不复可见,其情形见之于《闻知录》:“郡伯太衡公搜辑肃皇御制泊诸名家文籍,内颂美太师公者,附祀典、公移,为《世家二编》,万历丁巳(1617)授钅。”寥寥几语,可以看出它与《初编》所取材料比较类近,两书存在有机联系。《张太师世家》之《三编》也为张汝纪于1619年所辑,内容比较集中,以沈越的《皇明嘉隆两朝闻见录》、卜世昌的《皇明通纪述遗》和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记》三书为主,如杨道宾序曰,“公孙蜀郡太守汝纪采辑《嘉靖以来首辅传》、《嘉隆闻见录》、《通纪述遗》等书,哀成《世家三编》付诸梓,以志祖德,非谀词也,皆实录也”^②。

除了《张太师世家》之外,张汝纪也为《张文忠公集》主要编辑者,他在京师各公署中录得张璠昔年所撰文多篇,告归后,复求索亲族间里,并同原有奏疏、诗稿合并扩展为诗文集,于万历四十三年由贞义书院刊刻行世。^③ 而此前,汝纪、汝经就已将张璠所奉手敕381一道汇编为《谕对录》,并附有奏对录,凡14卷,刊行于世。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知道,《文集》的“辑录缮阅子孙职名”《谕对录》的“辑阅职名”与《初编》、《续编》的“校阅职名”、“参阅职名”的主体人员基本一致。编辑《张太师世家》与《太师张文忠公集》及《谕对录》由同批人同步进行,是张氏族人的共同作品。

	《文集》	《谕对录》	《初编》	《续编》
孙	汝纪,汝经	汝纲,汝纪,汝经	汝纲,汝纪,汝经	汝纪
曾孙	国瑞,国祯,国祐,国祉,国禧,国琦,国补,国禔	国瑞,国祯,国祐,国祉,国禧,国琦,国补,国禔	国瑞,国祯,国祐,国祉,国禧,国琦,国补,国禔	国瑞、国祯,国祉,国琦,国补,国禔

① 李光缙:《〈张太师世家〉后叙》,《张太师世家》,初编。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页。为“公之孙二千石太衡君辑公行事,自国史传而下以及墓铭、传记之属汇为一篇,名曰《世家》。按:《史记》,帝王称《纪》,将相文臣称《世家》。”认为《初编》即为张汝纪所为。

② 杨道宾:《〈世家三编〉叙》,《张太师世家》,三编。道光甲辰(1844)永嘉张氏重刊本。

③ 参见张汝纪:《〈张太师文忠公文集〉原跋》,张宪文校注:《张璠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页。

续表

	《文集》	《谕对录》	《初编》	《续编》
从曾孙	德明	德明	德明	德明
玄孙	世卿,世扬,世美,世相,世仁,世佐,世哲、世辅、世贤、世昌、世亮、世赏		世卿,世扬,世保,世美,世相,世仁,世佐,世哲、世辅、世翰、世贤、世昌、世亮、世雍、世赏	世卿,世扬,世保,世美,世相,世仁,世佐,世哲、世辅、世翰、世贤、世昌、世亮、世雍、世赏
从玄孙	天麟		士葵	士和,士藻
来孙	廷宾		宾,廷震,廷沾,乾亨,云龙	宾,廷震、廷沾,乾亨,云龙,际亨,弢,彝,芬
从来孙			师夔,之琦	

围绕着张璁编纂如此众多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一些子孙不远万里地抄录各种遗文或者不同的人对张璁行为的记载和评述,绝不是简单地为了保存文献。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家族文献的整理绝不只是为了显示家族的“陈迹”,而且有着鲜明的现实目的的,完全是为了家族建设需要而进行的。家族文献的整理,就是要在祖先与子孙之间建立起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使数百年以上祖宗之性情警款与数百年以下之子孙相接”。从家族内部而言,则是要子孙后代认同先祖所创立的光辉历史,得以为族人树立一个激励的样本。其次,从到万历年间,永嘉场科举进入最为兴盛时期,诸多士人以灶籍而考中进士,诗书传承,形成家学传统,使明代成为永嘉场文化发展高峰的标志,也使永嘉场进入历史上的极盛期。张氏家族则借助于家族文献,在乡邦社会和科举活动中,强调自身为世家的重要社会资本。

二、明朝嘉万时期私人修史与

《张太师世家》编纂之关系

《张太师世家》编纂者搜罗嘉靖、万历出现于坊间的有关张璁的历史记录和评价,除了地域社会因素之外,还与政坛时局变化以及时人对张璁的评价变化有关。张璁是嘉靖朝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主因是他借“大礼”之议而平步青云。大礼议是嘉靖朝政局的头等大事,其开端嘉靖皇帝的“继统”和“继嗣”问题,张璁作为“继统”的始作俑者,得到嘉靖皇帝支持之后,权倾一时,引起

巨大的礼制和人事变动,史家称此为“嘉靖革新”,以类比万历朝的张居正改革。无论如何,嘉靖朝大礼议所引发的事端影响了明代政治的整体走向。分析有关《世家》中的相关文献辑录的历史形态,必须将把文献放置回张璁与明朝大历史、大政治的关联中思考。

张璁主政内阁期间,辅权力急速加大之时,史称“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①,如赵翼指出的,“首辅之于次辅,虽同在禁地,而权势迥然不侔”^②。正因如此,嘉靖年间内阁成员之间的倾轧和斗争极其激烈,诸多朝臣不可避免卷入其中。张璁性格刚愎,“志骄气横,狎视公卿,虽桂萼等亦不敢抗,其余大臣颐指气使,无不如意。百司庶僚莫敢仰视”^③,由此也打击了不少同僚。作为大礼议中的风云人物,在朝之日,世人就对其言其行褒贬不一,攻击张璁等“大礼新贵”为“小人”、“佞人”、“迎合”之词俯拾皆是。张璁在世之时,即对自己的身后评价有所忧虑,嘉靖九年(1930)与夏言发生争论后,张璁逐渐失去了嘉靖皇帝的宠信,鉴于其他朝臣的大起大落,为了免于更大冲击,向嘉靖皇帝上疏请辞还乡,以保存晚节。

张璁过世后,明代私人修史达到高峰。其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明朝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起来,他们寻求各种机会来表现自我,史学于是也成为了这种表现的方式之一。二是嘉靖到万历时期两次重录各朝实录的工作,促进了私修本朝史的发生。嘉靖十三年至嘉靖十五年,政府下令重修实录,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外流传。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校勘记》所载,《实录》某明代抄本内有“浙西郑晓图书”印,此当为《吾学编》作者郑晓阅读过《实录》抄本之证据。^④如上文叙及的《张太师世家》之《初编》的编纂者之一——李思诚就“备员史局,读《肃皇帝实录》”^⑤。显然,读过实录者或抄本拥有者把涉及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补充,为私修本朝史提供了资料之便。

嘉靖、万历时期的私人修史数量浩繁、体裁齐备、内容广泛。从空间上说,

① 张廷玉:《宰辅年表一》,《明史》卷109。

② 赵翼:《明内阁首辅之权重》,《廿二史劄记》卷33,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483页。

③ 嘉靖七年八月甲子,《明世宗实录》卷91。

④ 参见黄彰健:《明实录校勘记》,《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年版,第9页。

⑤ 《李思诚序》,张宪文校注:《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首先由广东的陈建(1497—1567)撰《皇明通纪》而破冰,这是第一部系统记载明前“九朝”历史的通史专著,时人认为“览者以其编年叙事,文顺义明,遂推为本朝典故权舆。是始有目有耳”,撰就之后,广泛流行,被人们传抄或刻印流通。隆庆年间虽然遭到明廷下令禁毁,却“海内传诵如故”,各种增补、删节、接续、批点、仿撰之书出若春笋。在此风潮之下,由南而北,浙江、南直隶、江西诸地也开始有人修史。海盐人郑晓(1499—1566)以《吾学编》,浙江秀水人卜大有(1512—?)以《通纪续纪》、卜世昌以《通纪述遗》,南直隶常州人薛应旂(1500—1576?)以《宪章录》,南直隶太仓人王世贞(1526—1590)以《弇山堂别集》,江西丰城人雷礼(1505—1581)以《皇明大政记》等史著刊行于世。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的上述部分著作的版本,可以一窥万历年间私人修史的盛况。

书名	版本	作者
《宪章录》	明万历2年刻本	薛应旂
《皇明通纪述遗》	明万历刻本	卜世昌、屠衡
《两朝宪章录》	明万历22年刻本	吴瑞登
《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	明万历27年刻本	沈越
《藏书》	明万历27年刻本	李贽
《昭代典则》	明万历28年万卷楼刻本	黄光升
《皇明大政纪》	明万历30年博古堂刻本	雷礼

这些史著主要以记载政事与人事为主,相互之间有所借鉴,互有抄录,其情形犹如沈越之子沈朝阳在刊印《皇明嘉隆两朝闻见录》(1599)作序所云:

《纪》之自东莞陈建始,而以芜秽见黜。嗣是刻传于世者,薛宪副应旂则有《宪章录》,王司寇世贞则有《国朝纪要》。若郑端简公晓之《吾学编》,例从迂、固诸史,乃《大政》一记,仅提纲领而未详节目。高长史岱之《皇明鸿猷录》,体依《通鉴纪事本末》,各详一事,而不记岁年。然率皆起高庙,迄武庙止,而世、穆二庙概未有录焉。世载既久,耳目易湮。先大夫志存经史,学勤博洽,自嘉靖乙酉领应天荐,壬辰成进士。出作股肱,入司耳目,任怨任务,清苦自茹,鹄立乌台,已几九载。而直道难容,时宰欲杀,旋而外补,旋而归休,优游林壑复二十余年。身受国家之恩,官叨柱下之史,目击两朝盛际,凡有听睹,靡不记录,未获成书,赍志而歿。朝生也晚,

仅读父书,而不得探金匱石室之藏及百司掌故之府,每欲编次,无从考信。客岁大比,始于书肆见光州吴司训瑞登《两朝宪章录》、涪川范守己《肃皇大纪》,于是以先大夫之记录,取徵於二书,又本二书之纪载,旁采于他牒,参互订正,录而藏之篋中,盖将以需异日国史之出,为考正计耳。^①

私人史著大都记载了嘉靖朝之政事,对于大礼议时期的争论及宦官斗争均有详细记录,自然就涉及了张璁的相关评价。其中如郑晓名列左顺门哭谏群臣名单,为当事人且遭廷杖,感触甚深,评论“张入内阁,于是公卿大臣旬月三更。有志节者相率引去,在位者皆骯髒嗜利之徒”^②。不过,其晚年在编订《名臣传》时,有改变观点,论曰:“张文忠公晚年发愤,抗朝议,受知圣明,得柄用,揽才俊,屏苞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贵戢戢敛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③王世贞所著《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则不是一般罗列人物生平,明显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史观,以示嘉靖以来明朝政治之关键及政争之根源。私人修史加入了史家自己的思想倾向,也就逐渐成为宣扬个人所持史观的手段,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他们不必更多地在前朝史中去寻求抒发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去谈本朝历史。

与此同时,与大礼议之政治矛盾有关的群臣之文集也纷纷刊印。根据现存之刊本,如毛纪《密勿稿》(3卷)和《鳌峰类稿》分别刊刻于嘉靖十六年(1537)和嘉靖二十一年(1542),蒋冕的《湘皋集》(30卷)刊刻于嘉靖三十三年(1543),桂萼的《文襄公奏议》(8卷)刊行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杨一清的《宸翰录》刊行于嘉靖年间,杨廷和的《杨文忠三录》刊行于嘉靖年间、霍韬的《渭厓文集》(10卷)刊行于万历四年(1576),毛澄的《三江遗稿》刊行于万历二十八年(1590)。这些文稿中大部分为著者的后人或者门生故吏所编,对大礼议支持与反对的态度极为鲜明,由此所引发的对张璁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大量史籍和文献的刊行,极大地丰富了世人对嘉靖朝政局面的了解,也大大地吸引了张氏子孙的眼球,他们极为关注相关文献与史著对张璁的评价,自然会去做辑录与补正工作,这就张汝纪总结《世家》三次编辑时所抱有的态度:

纪祖考文忠公际遇肃皇帝,宠眷优渥,赐予之章,品评之类,当日在京

① 参见沈朝阳:《〈嘉隆闻见录〉序》,《四库丛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册。

② 郑晓:《吾学编余》,《百部丛书集成》第97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年版,第272页。

③ 郑晓:《吾学编》,《张太师世家》,初编。道光甲辰(1844)永嘉张代重刻本。

师者绪录颇多，第世隔路悬，不无沦逸。今诸公参辑国史传、御赞诗、手札、敕谕及碑志、名臣传记等书，于万历丙午（1606年）春编为二帙，称曰《世家》。至丁巳岁（1617），纪恭睹肃皇上御制洎诸名家文籍内颂美祖考者，附记与公移，再集为帙为《世家二编》。己未岁（1619），睹《嘉靖以来首辅传》、《嘉隆闻见录》、《通纪述遗》，复汇成帙为《世家三编》。纪不忍祖迹之湮泯，因并付诸梓。^①

三、《张太师世家》所隐含的政治矛盾之举证

史籍和文献的摘录和重抄是文献再生产的另一种重要形式，肯定会与原史料蝉翼差异。正如《张太师世家》摘抄者自己强调的，所抄录的文字以“颂美”之词为主，使用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笔法，就掺杂了抄录者的观点和看法，以家族为核心的抄录总是会对原史料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通过比勘《张太师世家》中所抄录的各种文献，可以发现，所有抄录文献与原本均存在一定出入。显然，这无法以“笔误”加以解释，而是族人在文献抄录上的故意行为。《世家》的编纂及内容选择均非简单地从文献传承上彰显祖德的行为，他们的目标事迹还牵连着明代政治史上的那一场激烈的斗争——大礼议。张氏子孙希图通过文献重整就是想达到掩盖对祖先的不利议论。下面举两个事例：一是《世家》“初编”抄录的霍韬所撰的《十善书略》；二是《世家》“三编”所抄录的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进行具体说明。

《十善书略》的作者霍韬，广东南海人，与张璁相知甚深，是嘉靖朝初期政坛上能够一直支持张璁的少见同盟军。比如大礼议告一段落后，政治斗争的重点转到张璁、桂萼与杨一清的身上，当言官陆粲弹劾张璁、桂萼纳贿时，霍韬即为其辩解，并把矛头指向杨一清。他《国是疏》显示出他们共同进退的紧密关系：“不意张璁、桂萼俱以罪黜，臣昔以议礼同进今官，璁、萼既去，臣岂宜独留。”^②又如张璁致仕之因源自于与夏言之间的斗争，霍韬一直为之不平。随着桂、张、方三人又先后告归，他独力与夏言斗争。嘉靖想进行劳民伤财的南

① 张汝纪：《〈世家三编〉跋》，《张太师世家》，三编。道光甲辰（1844）永嘉张代重刻本。

② 霍韬：《渭厓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藏明万历四年霍与瑕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8辑，第544页。

北郊祀,夏言为了媚主而极力支持,霍韬提出反对意见,夏言趁机对霍韬深加诋毁,诬公指斥乘輿,由此而下狱。张璁得知后,极力相救。可见,他们之间一直维持着荣辱与共的关系,张璁去世后,霍韬专撰两篇祭文,以示纪念。^①《十善书略》的内容非常具体,全面地概括了张璁在嘉靖朝为政的所作所为,为少有的赞赏张璁之词:

韬深敬罗峰翁者,谓其一心忠于朝廷,绝纤芥私也。主张大礼,不悚不慑,明千古之谬,伸圣主大孝,一也。辩明大狱,捄一家数十无辜冤命,破散蔽主之奸党,二也。在阁十年,未尝容内臣私请,政本清端,三也。居位不进一内臣,论事有回天之力,且革镇守,芟百余年积弊,四也。吏兵推选文武官,未尝片言干与。内臣病故,例荫义男、义侄、家童、校尉三十四人,罗峰削黜之殆尽,五也。风宪官皆知警戢,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溢,六也。革戚畹滥恩十八侯伯,七也。门私无谒,风清弊绝,八也。四归四召,行李惟一二衣箱如寒儒卑官,九也。在廷日只引用外甥一二人,亦才可节取,余则绝纤芥私,坦坦平平过,皆可见心迹至明,十也。罗峰翁有此十善,韬是故深敬之也。^②

遍查霍韬的《渭厓文集》,未有《十善书略》之篇目,细细核对原文,此文摘自卷七之《复泾野》。^③这是一篇书信体的论人评事之文,不是霍韬专门为张璁撰写的个人评述。泾野,吕柟(1479—1542)之号。吕柟,陕西高陵人,原字大栋,后改字仲木,号泾野,明朝中叶与王阳明、王廷相等齐名。明正德三年开科取士,湛甘泉任同考官,录取吕柟为状元,由此吕与岭南学人关系密切,成为北方宣扬“陈(白沙)湛(若水)学派”的重要成员。吕柟并不赞同张璁大礼议的观点,成见甚深,霍韬因陈(白沙)湛(若水)学派的原因(其二女嫁甘泉第三子),因此与吕柟有交往。此信的起因是霍韬受张璁之托,照看其子孙家族之事。托孤之事,《神道碑》中的一段话已有所表露,“(张璁)与渭厓霍公同心,议论间有不合,辄大争,归于一是则怡然解已。数争数解,无纤罅。而霍公后

^① 参见霍韬:《渭厓文集》第6卷,北京大学藏明万历四年霍与瑕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9辑,第122—123页。

^② 霍韬:《十善书略》,《张太师世家》,初编。

^③ 参见张宪文先生点校出版《张璁集》,附录中也收有此文的部分内容,可能意识到与《世家》的篇目不同,采用了《渭厓文集》原题,不过张先生也有意略去了下文所补出的内容。

护其遗孤尤力。”^①详情如《闻罗山计慰疏》有言：

闻温嘉之人炎凉，易视凌侮翁家，此生之责也。生后死者，如不能保翁家族，后日泉下何以见翁。幸翁无介，凡乡人小大事幸尽告生，宜代之处，必不得罪翁乡人，亦不俾乡人无理凌翁家，求两平乃已。无已，则为闻之圣主圣断，生且愿为翁任罪，不致翁后人失所也。此生义所当为，无所讳避。未及驰奠，先致疏慰，可读此疏于罗翁几前。^②

霍韬答应张璫托孤之事，吕泾野对此有不满情绪，以书信斥责霍韬，“生平日以公为可人也，今此疏如此，可谓阿私所好，不知人之甚也”^③。为了澄清误解，霍韬才在书信中详细论及张璫的为政为事之行止的正当所在。不过在复信还有另外一段文字，即：

罗峰毒生甚多，摧生甚力，皆意见不同，为异论所激之致。生亦未尝毫厘假借遇事，争形于色，久则两无后怨。盖罗峰久之知生无憾进至心。生知罗峰只见偏度狭，终无他也。故两无猜忌，遇事则争，争后释然，是生与罗峰相处之迹也。今罗峰去世，身后之忧，非生任而谁任？世人忌罗峰者，皆私意耳，非有为国真心。乡人顽薄，又何足怪？惟生终任之耳，执事无为流俗薄态可也。泾野得书乃日偶妄发言，知罪过矣。谨谢教云。亦可谓受善者也。韬再识。^④

《张太师世家》并没有抄录这段话，估计原因在于霍韬比较直接地指出了张璫性格中的“见偏度狭”，以至于“毒生甚多，摧生甚力”。掩去“托孤”一节，也则掩藏了张璫晚年所面临政治困境和受他人攻击的状况。但这却省略了理解和认识张璫很重要的内容。即霍韬对张璫的性格有深刻认识，张璫是刚愎有余而宽厚不足，在早年的共事中，两人意见不完全一致，张璫对霍韬也有所打击与微词。不过，更为重要的内容是霍韬表明自己对张璫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他比较客观地指出自己对张璫具有崇敬之心，是因为他耿直为国为公。霍韬还另有一封信给吕泾野，更为详细地言明张璫从“为国为公”而非结

① 葛守礼：《太师张文忠公神道碑》，张宪文校注：《张璫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页。

② 霍韬：《渭厓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藏明万历四年霍与瑕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9辑，第158—159页。

③ 霍韬：《渭厓文集》第7卷，所附《泾野柬》，北京大学藏明万历四年霍与瑕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9辑，第159页。

④ 霍韬：《渭厓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藏明万历四年霍与瑕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9辑，第159页。

党营私之状。^①综合这些文献才能看出,张璠与霍韬是不打不相识,一旦认识其真面目,自然能成生死之交。

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张璠事迹有不少记载,散见于各类文稿中,《世家》均有抄录。其中《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为王世贞晚年的代表性史学著作,也是研究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历史的重要史料,记述了杨廷和、张璠、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重要内阁首辅的政治事迹。比勘四库本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我们发现《世家》中抄录之部分分为卷一“世贞所称述”与卷二“张孚敬”合编,并有意删减了不少有关于内阁斗争的情形描述,尤其隐讳的是有关于张璠逐渐失宠的过程记载。《世家》以“孚敬乞致仕,上允之”一笔带过。核对原文,则另有一段缘由:

行人司正薛侃言:“上春秋鼎盛,未有皇子,宜择宗藩之亲贤者一人留之京邸,以俟皇子生而后就国”。上怒甚,命法司会文武大臣、台谏廷鞫。前是孚敬已心恨少詹事夏言,欲去之,未有间。而太常卿彭泽,孚敬客也,故与言争为都御史,有郗,而皆侃同年,侃尝出疏草示泽,泽怀以语孚敬,谓:“兹事上所讳,而侃与言故善,若疏上而侃得罪,使之引言,则并祸矣。”孚敬以为然。而泽乃语侃:“少傅甚善君疏,上当为从史,使必行有日矣。”泽复报孚敬,录稿以闻,而且谓言实使之。侃疏上,既就鞫,备受五毒,不肯吐主者,累日词不具,彭泽从旁以微词挑之,使引言。侃瞑目曰:“疏,吾自具。汝谓张少傅许而趣上之,与言何与?”都御史汪铉乃攘臂称:“言实使侃。”言拍案骂铉,几欲拳殴之。时孚敬犹在列,给事中孙应奎、曹汴前揖孚敬且回避。孚敬恚,趣入阁,复具疏言状。上乃悉下言、应奎、汴于狱,而命司礼中贵人侯勋、辅臣等鞫,具得其状以闻。上乃出孚敬二密疏示群臣而斥其伎罔,于是给事御史合论孚敬,责令致仕,而远戍彭泽,轻薛侃罪,令为编氓。^②

此处所记录的就是张璠与夏言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高峰,嘉靖十年六月的“廷鞫案”成为两人政治仕途的重要转折点。“廷鞫案”始末最为详尽见之于饶宗颐先生1930年搜罗潮汕文献无意间发现薛侃的《图书质疑》书末附有的《廷鞫实录》,《实录》从内容看,是由惠州府归善县人叶萼所撰,记录

^① 参见霍韬:《渭厓文集》第7卷,所附《泾野柬》,北京大学藏明万历四年霍与瑕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9辑,第159—160页。

^②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二,《四库全书本》。

了其师薛侃在嘉靖十年受到的刑讯经过。^① 结合《实录》审视《世家》所略抄的文字,可具体分析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与残酷,进而理解当时抄录者之意图。

薛侃(1486—1545),字尚谦,号中离,广东潮州府揭阳县人。正德十二年中进士,嘉靖三年因母丧回乡守制,嘉靖七年返京复职,薛侃与议礼诸臣关系友善,和张璁、彭泽更无夙怨。其当时,朝臣正为世宗将即位十年而久无子嗣一事颇为着急,担心武宗一朝无子嗣一事再度发生,当时世宗年未三十,尚在祈嗣,各方的争议让生性专横的世宗大为恼怒。与此同时,薛侃也对皇室久无子嗣一事,颇为关心,有意提出建皇储一事。但兹事体大,让他考虑甚久。而后彭泽来访,薛侃与彭泽同为广东人,更是同年进士,两人互有往来。

整个“廷鞫案”中,彭泽为关键人物。彭泽,南海人,其女嫁与湛若水二子柬之,与霍韬等人关系匪浅。他依托张璁,仕途顺畅,但也正因为此,与夏言之间的关系极为恶劣,一直想找机会扳倒夏言,这也是《廷鞫实录》开篇所谓的,“是难也,兆于孚敬,胎于夏言,而成于彭泽乎!”^②对于建皇储与否,薛侃只是单纯地向彭泽提起上建疏一事,并出示疏稿询问其意见。然而,彭泽得知此疏为政敌夏言所草拟,便心生计谋,立即告知张璁,指出薛侃奏疏实为夏言所拟,借此可以中伤夏言。得知此消息的张璁也认为是打击夏言的一个好机会,因此默许彭泽筹划此事。透过彭泽再三游说,薛侃许诺上疏,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彭泽遂袖疏草而去,归即誊出送与张璁”。张璁得到薛侃疏草后,便向世宗密奏此事,并指此疏实为夏言所草拟,故为其所主使。不久,薛侃果真上疏:

祖宗分封宗室,留亲王一人在京司香,俗呼为“守城王”。有事或为居守,或代行礼,其为国家虑至深远也,列圣相承,莫之或改。正德初,逆瑾怀异,遂并出封。乞查复旧典,于亲藩中择其亲而贤者,迎取一人,入京为守城王,选端人正士,为之辅导。他日东宫生长,其为辅王,亦不可缺。如有以次皇子,则仍出封大国,愿以臣言下廷臣会议。^③

^① 唐立宗:《从〈廷鞫实录〉看明嘉靖年间的政争与诏狱》,参见《通识教育与历史专业:东亚研究的微观与宏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桃园县万能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2005年版,第164页。《廷鞫实录》为广州中山图书馆藏本,1936年饶宗颐据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薛茂杞重刻本重抄。

^② 叶尊:《廷鞫实录》,参见唐立宗:《从〈廷鞫实录〉看明嘉靖年间的政争与诏狱》,《通识教育与历史专业:东亚研究的微观与宏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桃园县万能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2005年版。

^③ 《明世宗实录》卷128,嘉靖十年七月戊午。

嘉靖皇帝对于立皇储一事本就忌讳,加上背地结谋更是心存不悦。见疏后怒气即发,下旨廷鞫会审。掌管都察院的右都御史汪铤、刑部尚书许赞共同奉旨推问,然而廷鞫时,薛侃坚称夏言并未参与此事,明白指出彭泽曾赞同上疏之事,彭泽因此反被逮捕。在经过多日的用刑审讯后,薛侃饱受廷刑不改其供,而彭泽招认与谋。世宗对张璁构陷之举深感不悦,于隔日下谕给三法司,裁示结果:薛侃被削籍为民;彭泽则被褫夺官职,外放充军;而身为首辅的张璁因此事全然失去宠信:

辅臣张孚敬,初以建议大礼,朕特不次进用,既而被人弹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于思,罔悛于性。朕以心腹是托,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岂惟待遇是隆。乃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媚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赖。专于忌恶,甚失丞弼之任,难以优纵。着致仕去。^①

这场由张璁主导对夏言进行的政治攻势,从“张璁主动,夏言被动”的态势变成璁败言胜的结果。此后夏言的地位却如日中天,使其无法与之抗衡。张璁子孙目睹如此残酷之朝廷政治斗争,也深知先祖失宠的缘由所在。也正因此,凡涉及张璁在朝政治斗争之事,历来其讳莫深,由此就不难理解《世家》在抄录《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上的举措,即策略性抹去所有与党争有关联的文字。

四、结 论

前人已指出,传记文献受到政治影响或者私人关系,为尊者讳,文过饰非,不免失真。《张太师世家》所辑录的史籍,主要关于张璁言行,可视为是张璁传记之集成。不过,家族文献作为史料,学人一定要清醒地知道这是特定群体所希望留存后世的史料而具有特殊性质,因为其编辑或生产不可避免要受到特定时代的知识类型和文化定式的影响,甚至于政治要素的引导,它的生成本身是一个历史文化过程。一般而论,为了使家族文献的史料价值得以最大限度体现,一定要开阔视野,所抄录的文献进行史源学的勘定,注重各类史料的比勘、辨别,通过对对偏颇记载或者无意疏漏之中寻找到家族群体或者编纂者

^① 《明世宗实录》卷128,嘉靖十年七月戊午。

个体的历史认识与历史意图。而本文所列举的个案旨在说明,种种篡改或者略钞,其背后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动因,也就是说,张汝纪等人深知张璁为首辅时因“大礼议”所导致的政治矛盾,在编纂时少抄或漏抄相关资料,就是文献选择上注入了自己的主观社会认识,从认识而言,这是朝廷政治斗争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延续,因此,《张太师世家》编纂是特定时代下的家族、政治与文献的复杂作用的结果。